

857

逃 出 了 赤 都 武 漢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1141B

逃
出
了
赤
都
武
汉

周
佛
海

著



~~274453~~

目次

- 一 小引
- 二 共產黨成立時之狀況及我和共產黨的關係
- 三 武漢叛逆運動的內幕
- 四 我所知道的叛逆運動的經過

逃出了赤都武漢

——共產黨及國民黨叛徒破壞國民革命之實地寫真——

一 小引

我是五月十八離開漢口的，十九日，舟過九江，危險地帶已經過去，便在船上草了「逃出了赤都武漢」一文，已成萬字，還沒有完結。不意舟甫抵滬，即因誤會被捕，以致那篇文章，到現在還存在總司令部駐滬軍法處，沒有得發表。現在重新起草，不僅把這次武漢叛黨叛國經我親見親聞的事實宣佈出來，並且要稍加擴張，把共產黨成立以

來，我所親歷的事實，一齊宣佈。因為在民國十三年五月以前，我的確是個共產黨黨員，而且是比較重要的共產黨黨員，自從民國十三年六月，無形脫離，同年九月正式脫離了共產黨以後，我便是共產黨的敵人，共產黨便是我的敵人，我的工作的一部分，便是反對共產黨，（以下縷述事實）共產黨的「嚮導」和「中國青年」上面，也便明白的攻擊起我來了，「中國青年」上罵我，何等刻薄！他們說：「周佛海已經死了！」

共產黨于決定加入國民黨之前，對於「聯孫乎？聯陳乎？」一問題，徘徊考慮了很久。這件事，恐怕外而很少有人知道。陳是誰？便是叛黨逆賊陳炯明！第三國際代表馬林和譚平山陳公博三人，曾到惠

州西湖三次，和陳炯明商量聯絡條件，以反抗「孫派」，這恐怕也是外面的人所不知道的事！這種情形，容後再述。即此一點，就可見共產黨是實力主義，是利用主義。他們的手段，是利用實力以完成他們的陰謀。他們加入國民黨，不是因為信仰三民主義，也不是因為要實行國民革命，乃是因為要利用國民黨的招牌，潛伏在國民黨的內裏，發展他們的勢力。他們只求「共產黨」的成功，甚麼民族解放，國家獨立，都不過是他們欺人的幌子！試看他們在加入國民黨之前，還要聯絡吳佩孚！他們利用李大釗和孫伯蘭的關係，派李大釗到洛陽，勾結吳佩孚，所以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作用，也和他們「聯陳」「聯吳」的作用完全一樣。

以下連述帶評的詳叙我所親知的事實。因為要叙我所親歷的事，所以不得不以我自己為中心。

二 共產黨成立時之狀況及我和共產黨的關係

共產黨怎樣成立的？這大概除非和共產黨有過關係的人不能知道。俄國革命以後，社會主義的思潮，澎湃全世界。當時在上海介紹社會主義的出版物，有「新青年」「星期評論」，和「解放與改造」。當時我在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讀書，常在「解放與改造」上面介紹社會思想。因此文字上，和當時主辦該誌的張東蓀發生關係。民國九年暑假回國，在西湖住了兩月，九月初到上海。張東蓀說，陳獨秀

約我們談話。當時同他到環龍路海洋里二號晤陳，這就是我會着陳獨秀的第一次。當時談話的人，除我及張陳二人外，有沈雁冰，和第三國際代表吳庭斯基及其翻譯楊明齋，談話時，吳庭斯基，主張中國須即刻組織共產黨。張東蓀似不贊成，我和沈未發言。後來陳又約我談話，說上海方面有邵力子，沈玄盧，陳望道，李漢俊等人，均主張即刻組織，請我加入，我便答應了。我爲甚麼加入共產黨？當時的思想，真是幼稚。但亦事實使然。因爲當時我不過是個高等學校（等於中國大學預科）的一年級生，年齡不過二十二歲。學力經驗，都是起碼程度。當時只以爲現在的制度不好，要努力打破。而共產黨却是打破現存制度的組織。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要革命，共產黨是最革命的

團體，所以我們要革命必須加入共產黨。至於共產主義的革命，是革命的一個方法，不是革命的唯一方法；共產黨，是革命的一個組織，不是革命的唯一組織；以及適於俄國的主義，是否適於中國：關於這些問題，既然沒有明瞭的概念，也沒有深刻的研究。我想加入共產黨的青年，大部分和我當時的思想一樣。大家要求革命，而以爲共產黨是革命的黨，共產黨員也大吹特吹他們的黨是最革命的黨，於是大家受了麻醉，相率加入了共產黨。其實大錯特錯！命，我們是要革的。但是要革命完成，必須有革命的主義和革命的方法。革命主義和革命方法，是各時各地的特殊環境所產出的，也只有各時各地的特殊環境所產出的特殊革命主義和方法，才有成功的可能。所以中國革命，必

然而而且應該由中國的特殊環境產出特殊的革命主義和方法。不能生吞活剝的信仰舶來的革命主義，不能削足適履的採用輸入的革命方法。舶來的革命主義，輸入的革命方法，因為不適用於中國的要求，因為不是對症的藥，所以不僅不能治國，不能救民，而且要誤國，要害民。但是這些道理，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我并且相信許多加入共產黨的青年，也沒有想到。

加入組織共產黨以後，不久就到日本去了。以後共產黨便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長沙，濟南各地組織起來。并在上海出一機關月刊，名為「共產黨」。我這一年的工作，就是在「共產黨」上做了三四篇文章。不久陳獨秀應陳炯明之召，赴粵充教育委員會委員長。

上海的事，托李漢俊招呼。當時在上海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向各工廠活動。不過這時我在日本，詳細的情形，不甚知道。次年，民國十年暑假，得到上海通知，定於七月開各地共產黨代表大會，討論黨綱，組織中央幹部。我便以留日代表的資格，回國參預。其實當時留日的共產黨黨員，除我外，只有施存統一人在東京。當時出席的人，廣東代表陳公博，包惠僧，上海代表李漢俊，李達，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濟南代表是兩個學生，以後不甚聞名，忘其姓字，日本代表是我。第三國際代表是馬林及尼柯爾斯基。我們便在貝勒路李漢俊家開起會來。當時內中就分了兩派。張國燾，劉仁靜等，自命為真正的共

產黨，而攻擊李漢俊和我是灰色的。一連開了六晚，報告各地狀況，討論通過黨綱，最後就要決定目前政策，決定中央組織和人選。誰知到了第六晚，爲法界包探偵知，正在開會討論的時候，忽來一形迹可疑之人，闖入屋內，一望而去。我們知道事發，隨即散會。半點鐘後，法捕華捕十餘人，包圍漢俊住處，捉拿過激派。當時只剩下陳公博和李漢俊二人。陳公博說的北京話，與日本人說北京話一般無二。巡捕硬說他是日本的過激派，虧得李漢俊應付得好，當時幸得無事，但是陳公博却嚇得魂不附體，次晨使一溜煙逃往杭州去了。當晚十二時，我們又在陳獨秀家開會，決定第二天赴嘉興南湖開會。第二天到了南湖，租了一隻大船，蕩在湖中開會，真是人不知鬼不覺。當日討

論最烈。因爲張國燾等主張南北是一邱之貉，對於南北政府，應一律攻擊，我和包惠僧主張應與廣東政府合作。結果，他們的主張通過，當時的幼稚就可想而知了。不過當日第三國際代表沒有預會，以後他們便把張等的主張打消，主張仍應與南方政府合作。第三國際代表個人的意見，可以打消大會的決案，他們的權力，也就可想而知了。當日又選舉重要職員，選陳獨秀爲委員長，張國燾等運動舉李大釗爲副委員長，選舉的結果，副委員長却是我。宣傳部長李達，組織部長張國燾。當時陳獨秀在粵，我便代行委員長職權，開始活動。經費呢？不待說是盧布換成的鈔票，他們給我每月八十元大洋的生活費，此外還有一點活動費。九月中旬，陳獨秀返滬，陳獨秀和馬林大鬧意見，

不肯和馬林見面。因為馬林說一年以來，第三國際在中國用了二十餘萬，而成蹟如此，中國同志，未免太不努力。陳獨秀則以為我們那裏用了這樣多！一半是第三國際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好麵包，如何誣賴別人。其實究竟用了多少，因為我在日本，不得而知。不過在我代理委員長期內，不到兩月，確經手用了一萬兩千元，而張國燾所組織的「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經費，還直接去領，不經我手。陳馬尙未晤面之時，陳獨秀被捕了。其時華盛頓會議開幕，第三國際因為對抗起見，在伊爾庫次克開遠東弱小民族會議，電全中國共產黨組織各界的代表團。於是我們一面營救陳獨秀，一面派人四出「尋覓」代表。包惠僧赴粵，劉仁靜赴北方，張太雷赴日本，（第三國際全中國共產

黨代辦日本代表事）我親自赴長江一帶。限二十日內返滬，邀集蕪湖，安慶，武漢，長沙，四處代表。我當時以十二分的力量活動，結果「覺得」代表三十餘人，都是學生，但冒充工人或商人的代表，一批一批的送赴俄國。

十一月初，我便與當時的愛人，現在的夫人楊淑慧女士赴日求學去了。自從此時起，直至民國十三年三月回國的時候止，我對於共產黨便沒有甚麼貢獻，沒有甚麼工作，而且在這兩年多之中，思想上發生了個極大的變化。這兩年多之中，因為我專門讀書，不管共產黨的事，所以關於共產黨的事，不甚詳細知道。不過關於勾結吳佩孚，聯絡陳炯明的事，以後聽見共產黨朋友，對我說過、現就所知的，略述

一點。

共產黨的政策，可以說是娼妓政策，賣淫政策。怎樣說是娼妓政策？娼妓沒有一定的愛情，更無所謂節操，誰有金錢，則向誰灌米湯。共產黨無一定友黨，更無所謂革命的道德，誰有勢力，則向誰勾結。娼妓惟金錢是圖，共產黨惟勢力是視。共產黨始而勾結陳炯明，繼而勾結吳佩孚，終而混入國民黨，現在却來破壞國民黨，和娼妓朝姘甲而夕姘乙有甚麼區別？怎樣叫做賣淫政策？娼妓以顏色和肉體賣與嫖客，共產黨則以民衆爲商品賣與蘇俄和軍閥。他們自稱代表許多民衆，能指揮多少民衆，拏民衆做招牌，去向第三國際騙錢，以民衆爲商品，要賣給吳佩孚，陳炯明；以民衆來號召，混入國民黨，現在

更捏造民衆的意見，來破壞國民黨。娼妓以肉體爲商品，共產黨以民衆爲商品，因之共產黨的政策，又何異於賣淫政策？可憐的民衆！他們被共產黨出賣了，欺騙了，強姦了，還在夢裏頭過日子！民衆呵，快醒罷！

共產黨因爲要和吳佩孚勾結，所以首先送他一個「開明的軍閥」，「進步的軍閥」的尊稱。當時孫洪伊和吳佩孚接近，而李大釗却和孫洪伊關係密切。（編者按李大釗與吳佩孚的要人白堅武，是極好的老朋友，這是作者所未知的。）他們利用這種關係，就和吳佩孚私通起來，李大釗赴洛陽數次，似乎當時報紙，也有記載。他們的手段真巧妙！京漢，京奉，津浦，隴海四線的總稽查，都由吳佩孚電令高恩洪

委共產黨人充任。京漢線總稽查爲包惠僧，津浦似乎是李民治，其餘二線的人，因爲我向不認識，所以不能記其姓字。他們究竟以甚麼條件，交換得來，却不是我所能够知道的。

吳佩孚又是好惹的嗎？共產黨想利用吳佩孚，吳佩孚又何嘗不是利用共產黨？「進步的軍閥」，也屠殺起工人來了，吳佩孚竟和共產黨宣告離婚了。

共產黨見棄於吳佩孚之前，曾一度和陳炯明妍識，陳炯明由閩返粵，桂系崩潰以後，就招陳獨秀赴粵爲其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當時陳炯明逆跡已著，廣東顯分孫陳兩派。共產黨究竟聯孫，還是聯陳？在當時却是個很大的問題。共產黨當然以實力爲轉移，而當時粵桂的實

力，似乎都握在陳炯明手中，所以共產黨遂和他勾結，陳炯明每月出五百元，同陳公博辦「羣報」，就是互相勾結的一個結果，以後陳炯明匿居惠州的時候，馬林和譚平山等（時陳獨秀已赴滬）疊次赴惠，商量合作條件，誰知陳炯明竟敢炮擊觀音山，危害總理。陳逆經此叛逆行爲以後，爲國人所唾棄，共產黨畏輿論的攻擊，遂也不敢明目張膽的聯陳。北爲吳佩孚所棄，南和陳炯明絕緣的共產黨，遂於民國十二年奉第三國際的命令，設法混入國民黨，而肆其破壞國民黨的陰謀了。

這便是我在日本的兩年多內，共產黨所做的重要事項，其餘詳細情形，因非親身經歷，不能敘述。

這兩年之間，我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便漸次動搖起來了。說來實在奇怪！我高等學校畢業後，就進了西京帝國大學經濟科。日本馬克思主義的泰斗河上肇博士，便是我們的教授。照道理說，我們聽了他幾年的講，讀了他許多的書，非共產主義者，都應該變成共產主義者，誰知適得其反，本爲共產黨員的我，聽了他的講，反不贊成中國實行共產主義來了。這不但我是這樣，當時許多同學，也是如此。例如現任總政治訓練部編撰股股長薩孟武同志和徵查股股長李超桓同志，都是愛聽河上的講，愛讀河上的書的人，然而都反對中國採用共產主義。我們幾個同學，常常討論研究，結果我們一致主張中國經濟方面，目前只能採用國家資本主義，漸次向着社會主義進行。有些人很

奇怪，以爲河上教授教出的日本學生，許多成爲社會主義者，而所教的中國學生却幾乎全部成爲反共產主義者。其實一點也不稀奇！因爲中國的經濟條件，和日本的不同，如果成爲社會主義者的日本學生，生而爲中國人，他們一定會反對共產主義；反之，反對共產主義的中國學生，如果生而爲日本人，他們一定會變成共產主義者。人類的思想，是要受環境支配的。

爲甚麼我聽了河上教授的講，思想出了變化？因爲河上教授，是頭腦非常冷靜的學者，不是浮躁的煽動家，他極精密的研究唯物史觀，極嚴格的應用唯物史觀，他極力反對「早熟的社會革命」，他以爲時機過早的社會革命，不僅不能促社會進步，而且要引起社會的退

化，他并且引了許多事實，證明他的理論。因此我便感覺到在經濟狀態等於產業革命時之英吉利的中國，企圖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實在是「時機尚早」，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要具備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物的要素，便是生產規模的擴大和企業的集中；人的要素，便是無產者的階級自覺，和其數量增加，團結堅固。我們的眼光，如果不僅限於上海，廣州，和漢口，我們的眼光，如果遍及全國，細密的檢閱中國工廠勞動者在中國全人口中所佔的百分率，并檢查工廠工業在中國產業界中所佔的地位，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否認共產主義之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在中國幾等於零，中國實在沒有實行共產主義的基礎和條件。此外，馬克思的研究對象，是歐洲的社會狀況，尤其是產業

先進國英吉利的社會狀況，以產業先進國的社會狀況爲基礎而得的結論，怎能無條件的適用於產業落後的中國？而且自從俄國革命以後，馬克思主義，爲俄國共產黨所曲解，而變爲列寧主義，德國馬克思主義泰斗考茨基和列寧，互相攻擊，各不相下。只就馬克思主義而言，也分爲伯倫斯坦的修改派，考茨基的社會民主黨，和列寧的共產派。所以馬克思主義他本身，理論上也沒有一定的標準，派別紛歧，莫衷一是，就是列寧的共產派，又分爲特羅茨基派和齊諾維埃夫派，他們的本身，既然沒有一定的統一的理論，怎好把他的理論，無條件的適用於中國，俄國的共產主義，理論上，已被馬克思正統派的考茨基，攻擊得體無完膚，事實上，在俄國已行不通，而改用新經濟政策；我

們爲甚麼還要把這種理論上沒有根據，事實上已經失敗的主義，生吞活剝的來適用於中國？我們並不是像英國的自由學派，迷信資本制度爲永久的絕對的經濟組織。資本主義的文明，早晚必要破壞，這是我們所深信的。然而資本主義的崩壞，究竟取何種途徑，打倒資本制度，究應取何種方法，却不能不因時而異，因地而殊。甲國所經歷的途徑，不一定發生於乙國；乙國所採用的方法，也不一定適用於甲國。所以同一社會主義陣營之中，在德爲社會民主黨，在法爲工團主義，在英爲基爾特社會主義，在俄爲共產主義。中國有中國的特殊環境，特殊歷史，應該有中國的特殊革命主義和方法，決不能把數萬里河山，數萬萬人民，當做俄國附屬國，當作第三國際的試驗場，當做

赤色帝國主義抵抗白色帝國主義的工具！

這些理論，詳細伸引起來，簡直可以做出的一本書，現在聊盡於此，以後在別的地方，再行詳論。

我根據上面簡單敘述的種種理由，對於共產主義，便漸次愈隔愈遠了。然而當時還沒有正式脫離共產黨。這是因為共產黨黨員，在東京不過三數人，在西京只有我一個。我對於共產黨，既沒有工作，共產黨對於我也沒有甚麼束縛。共產黨和我，事實上已經沒有關係，我的言論和行動，都可自由，共產黨沒有來束縛我。當時既沒有感覺不便，而且我的性情，向來又比較疏忽，因此名義上還沒有脫離共產黨。

十二年下半年，共產黨黨員，都以個人的資格加入國民黨了，十

三年一月，國民黨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了。當時決定中國的革命，是國民革命，而以帝國主義和軍閥爲革命的對象。我起初聽見，非常高興，以爲共產黨的人，都覺悟了，都認清中國現在應該行民族革命，實現民主政治，而解決經濟問題，不宜行階級鬥爭的社會革命。但是不久却又懷疑起來了。就是懷疑此後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係，應該怎樣處理。我們既然承認和國民黨的目的相同，且進而加入國民黨，爲甚麼共產黨還繼續存在？既然大家加入國民黨，共產黨就應該解散。如果說兩黨的最後目的不同，目前不過暫時合作，那就應該兩黨平行的合作，共產黨員不應該加入國民黨。一方面說暫時合作，共同擔負國民革命；別方面共產黨員，又都取得國民黨的黨籍；等到暫時合作

的目的——國民革命——成功之後，兩黨的關係怎樣？我當時就覺得是種矛盾。於是便寫信問陳獨秀。第一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究竟是甚麼作用？第二問我們加入了國民黨，就要受兩種黨紀的束縛。如果兩黨的紀律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究竟應該服從那一黨的紀律。他當時的回答，說這是第三國際定的策略，令中國共產黨實行的。對於我的第一問，他以爲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有兩個作用。第一步，利用國民黨的招牌，發展共產黨的實力，因爲如果拿着共產黨的招牌去活動，一定到處碰釘子，因爲人家一見「共產黨」三個字，就會望而却步，拿國民黨的招牌，就可和各方面接近，拿國民黨名義，做共產黨的工作，這便是第一個作用。第二，就是使國民黨共產化。因爲共產黨黨

員。既取得國民黨黨員的資格，就可在國民黨內掌握黨權，操縱黨務，製造黨論，煽動黨員，而使國民黨漸變為共產黨。因為事實上，國民黨本來的主義和政策，既然無形消滅，徒有國民黨的空名，事實上等於亡黨，這便是他答我的第一問。今年一月間，我和鄧演達談及此事，鄧演達說：「現在不是國民黨的共產黨化，反是共產黨的國民黨化。」這種見解、非常錯誤，所以當時和他稍為辯論了幾句。共產黨員，能在國民黨內操縱一切，而國民黨員，對於共產黨的黨務，不僅不能參預，而且不能預聞。我們用甚麼方法能使之國民黨化？

陳獨秀答覆我的等等質問，以為如果兩黨的紀律或命令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應該服從共產黨的命令和紀律。因為我們是奉第三國際

的命令加入國民黨的。所以對於我們的最後的最高的指揮權，當然仍在共產黨。

這便是陳獨秀對於我的答覆。他所說的意見，以後便一件一件的實行起來了。只要看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後的行動，便可知道。

我當時的意見，是主張取消共產黨的。我曾把我的意見，寫信告訴包惠僧等幾個人。我的理由很簡單。就是共產黨的招牌既然拿不出來，就是證明中國現在不需要共產黨；既然是社會所不需要的黨，何必一定要勉強維持他？然而這是第三國際的命令，我們人微言輕，有甚麼用處？

十三年四月，我應戴季陶先生之命，赴粵工作。當時我還沒有正

式脫離共產黨，所以還得參預共產黨黨務，而出入於東山鮑羅庭的住宅。譚平山每遇重要的事情，常約我和張崧年同赴鮑宅商量。老實說，不是「商量」，實是「請示」。實際當時我和張崧年，便是最不忠實的共產黨黨員。張崧年不久便也退出共產黨了，我是九月退出的，他大約是次年一月退出的，時已赴北京。

鮑羅庭告訴我們的策略，最重要的就是把國民黨分做左右兩派。他把當時的中央黨部當做左派的機關，把廣州市黨部，當做右派的機關，使這兩級黨部暗中互相排擠，他叫我們以國民黨員的名義，攻擊不接近共產黨的黨員。又捏造所謂右派（？）的名義，攻擊胡廖戴諸先生為賣黨。務必使國民黨自己分裂，以便共產派乘機壟斷黨務。此

外，對於國民黨的領袖和民衆團體，也告訴我們一種策略。對於國民黨的領袖，如果要利用，而他可受利用的，便極力替他鼓吹，替他捧場。例如他們現在對於汪精衛，便取這種策略。對於不要利用，或強欲利用而不受利用的國民黨領袖，便極力誣謗，極力詆毀，務使其信用墮地，在黨內及社會上沒有立足的餘地。例如他們現在對於蔣總司令及前年下半年以後對於戴季陶先生，便取這種手段。在社會上及黨內的地位，幾等於零的我，也嘗過他們這種苦滋味！對於民衆團體，務必設法操縱，如果不能操縱，務必設法破壞，使其不能成立。他說我們不能操縱的團體多一個，便是我們的敵人多一個，至少我們的工作，要多一層障礙。這便是鮑羅廷告給我們的戰術。試看幾年來

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及黨外的活動，就可知他們忠實的，甚至變本加厲的運用這個戰術了。

關於農工運動，共產黨一意包辦，不許真正的國民黨黨員染指。我只舉出一件事實，便可證明。十三年中央黨部，還設在廣州惠州會館時，農民部開辦第一次農民運動講習班，招生考試。記得是在譚平山的私宅閱卷。閱卷的方法，真和普通不同，不是閱文，乃是先看投考者的名字。凡屬於共產黨或為共產黨作工具的人，不必閱其文字，即行錄取。真正的國民黨員，均棄置不錄，結果非共產派，不要想參加農民運動。這是我親身經歷的，共產黨無論如何，不能置辯。

總而言之：我親見親聞的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行動，就是發展共

產黨的勢力，包辦農工運動，吸收有爲份子，和破壞國民黨的基礎。分離國民黨的中心，操縱各級黨部，和詆毀三民主義。（他們雖然沒有明目張胆的詆毀，然而在共產黨內，以及對於傾向共產的人，常指摘三民主義爲不澈底的主義，爲非驢非馬的主義。）

當時極不贊成共產黨的策略，然而還沒有脫離共產黨的，在廣州就是張崧年和我。我們兩人同在廣大當教授並且同住一處，常常討論，然而沒有辦法，我覺得我自己非常矛盾。不贊成共產黨而又沒有脫離共產黨，這是第一個矛盾。外面的人看我做共產黨員，不肯和我接近，共產黨內部，則攻擊我爲「知識份子」，把我當做不忠實的共產黨黨員，這是第二個矛盾。我既然處在這種矛盾的環境之中，過這

種矛盾的生活，當然有無限的痛苦。要解除我的痛苦，只有打破我的矛盾環境，要打破矛盾的環境，只有兩條路：就是或為忠實的共產主義的信徒，或為忠實的三民主義的信徒。這兩條路由我自己選擇。對於共產主義，既然失掉信仰，對於共產黨的行動，又完全反對，當然不能成為忠實的共產主義的信徒，於是決心做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而要作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便須脫離共產黨，我決心了！我覺悟非脫離共產黨，不能解決我的矛盾，不能解除我的痛苦。於是便寫了一信給廣州區執行委員會，說我的思想變遷，要脫離共產黨。信剛寫完，適包惠僧來，我就將我的意見，和他說明。他自然勸我不必。那天晚上十一點鐘，我們都已就寢，周恩來忽扣門求見。他是廣州執委，

聽見包惠僧說及我的事，因來相勸。我當時將信交與他，他立刻撕碎，勸我不要再提。但是我已決心，怎能挽留。第二天，再由郵寄去一信，以後廣州執委，將信轉寄上海中央執委，上海回信，聽我退出。於是我便退出共產黨了。我的矛盾解決了，我的痛苦解除了，我的生涯開了一個新紀元，我的生活得了一個新天地。

以後便開始反對共產黨了。汪精衛有次對我的一个朋友說：「周佛海真折爛污，他以前是共產黨員，現在却攻擊起共產黨來了。他退出共產黨就算了，還要來反噬。真不是東西。你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一起做事。」我現在却要學他說：「汪精衛真折爛污，他本是國民黨的黨員，現在却要做共產黨的工具，攻擊起國民黨來了。他跑到

外國去就算了，還要來倒戈。真不是東西。我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共事！」其實我退出共產黨後，反來攻擊共產黨，既有正確的理由，又有深切的必要。

我退出共產黨，是因爲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中國，是因爲共產黨陰圖傾覆國民黨。我既然認識了這兩件事實，如果沈默不言，便是國的罪人，便是黨的叛逆。我寧肯而且應該做共產黨的罪人，做共產黨的叛逆，不願意而且不應該做中國的罪人，國民黨的叛逆。要做中國的忠實國民，便須明白的排斥不合國情的共產主義，要做國民黨的忠實黨員，便須痛切的攻擊破壞本黨的共產黨！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

我便開始我的工作了。第一步便是約同廣大幾位教授如謝瀛洲黃季陸等，創辦「社會評論」。謝黃二同志是反對共產黨的健將，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以後瀛洲在粵，被共產黨當做反動派，壓迫得幾乎不能活動，季陸被共產黨當做西山派，竟排出國民黨之外。「社會評論」的主要目的，便在反對共產黨。但是當時中央黨部，完全為該黨所把持，共產黨在粵，幾有炙手可熱之勢。我們實在不能明白的攻擊的共產主義。因為一觸他們的怒，他們便可以國民黨的黨紀來壓迫我們。所以只有字裏行間，以及論文的用意上，暗中加以攻擊。然而還是不能避免他們的疑忌。共產黨所主持的青年軍人聯合會，竟呈請中央黨部令當時廣大校長鄒魯君辭退我們。幸得鄒君極力維持，始得無事。

但是我們「社會評論社」的人在廣東，差不多不易立足。我當時在廣大教授社會主義。我想以河上肇教授我們的方法，嚴格的開釋唯物史觀，給學生以暗示，並想在講義最後，設一章「社會主義與中國」，闡明中國不能實行共產主義的原因，不幸因劉楊叛變離粵，該講義沒有完成。十四年六七月間，在滬晤戴季陶先生，時戴先生正草「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小冊，將原稿示讀。該書揭穿共產黨的寄生政策，實在是革命史上的一種極重要，極有價值的著作。當時讀罷大喜。因為戴先生真能代表一般忠實而明瞭的黨員，發表其所欲言而不能發之意見。戴先生囑我亦作此類文章，惟因當時貧病交加，（因為貧，所以忙於譯書賣稿。）而且似乎話都被戴先生說完了，因此沒有做成。

只在「孤軍」雜誌上發表一篇「國民革命中的階級問題」，反對在中國主張階級鬥爭。當時很有反響。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中國青年」，就著論反駁。以前三月間，曾在「社會評論」上作「中山先生思想概觀」一文，闡明中山先生的社會進化論，深刻於馬克思的。因為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中心，而孫先生是以民生為歷史的中心。來滬後，戴先生特將此文印成小冊，並代作一跋。以後便病了。廣大開學了，九月過了，十月過了，學校連電催促，而我尚病臥床榻。直至十一月始愈。九月初，曾作「反共產與反革命」一文，痛擊共產黨所言之反共產即反革命一口號之不當。在「孤軍」雜誌發表。不待說，「中國青年」又來反攻了。我對於他們的反攻，也來反攻。就是在

「獨立青年」上發表一篇「再論反共產與反革命並答中國青年」。以後因病，便無工作了。十一月返粵，時廣大正開查辦案，汪精衛聽鮑羅廷的指使，想以廣大為赤化教育機關。我正在此時返校，於是聯絡教授三十餘人，聯名辭職赴滬。此次到粵，只住兩週，便離開了。

抵滬後，我親自起草宣言，並由我領銜發表，痛擊汪精衛和鮑羅廷的狼狽為奸。這個宣言，上海各報，都經登載。汪精衛後來說我們拆爛污，就是因為這篇宣言。宣言發後，便在上海持志，國民，大夏，同濟各大學講演，揭穿共產黨的陰謀及共產黨主義之不當。於是「中國青年」上，便大呼「周佛海死了」。瞿秋白在「嚮導」上，以列寧主義來攻擊「周佛海主義」。（這是他替我造的名詞，我覺得有

無限的光榮。因為我當時在某報上說「打倒帝國主義」一語，有兩種解釋。共產黨的解釋，是即刻根本打倒帝國主義，即打倒資本主義。我們國民黨的解釋，應該是首先打倒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時國民黨的一部分同志，在西山開完會議，擬於上海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定我為宣傳部部長。當時因種種關係，沒有正式就職，（但是的確常出沒於環龍路四十四號）即赴日本。以後他們便把我當做西山會議派了。第二次代表大會也向我警告了。共產黨何等險毒，以國民黨的黨紀，壓迫國民黨的黨員，而遂他們的陰謀！於是不僅是共產黨的叛徒，共產黨並以我為國民黨的叛徒了，連去廣東的自由都沒有了。當時粵中同志，尚設法要我赴粵，但是在共產黨的壓迫之下，我竟終

身不能入粵境了！十五年三月由日返滬。時郭復初同志爲武昌商大校長，電約我爲教務長，於是起程赴鄂。到了武昌，匿名信紛至踏來，約有二十餘封，大致都說武昌是首義之區，決不容我這個反革命份子存在，如果我不即刻離開武漢，便以鐵血見。這種滑稽喜劇，自然是共產黨徒所演的。誰是小孩子，怕人慌嚇；硬幹下去，便也無事。七月，暑假期至，便離鄂暫行返滬了。

這個時期，共產黨把反革命的頭銜，加在我的頭上，壓迫得我不能參加國民革命，排斥我出了國民黨。然而黨部爲他們劫持，民衆爲他們操縱，我們一肚悶氣，向何處發洩！

九月，我軍克服陽夏，革命潮流，日形發展，而共產黨的勢力，

也隨着擴大。我遂決心打破共產黨的排斥，要效法重行參加革命了。時戴先生到滬，便親介紹我見總司令。到了漢口，總座已赴贛督師。時鄧演達叛跡未露，且爲總部武漢行營主任，我就將戴先生之信，交他拆閱。他一面致電報告總座，一面委我爲總部行營祕書。到了此時，才得重行加入革命戰線。

然而此時，右派，西山派，反革命份子等名詞，還不時的加在我的頭上，每因事到總政治部，或湖北省黨部，常受莫明其妙的諷刺和排斥。我只有忍耐下去。後來他們知道，總司令對我甚好，也就不敢明目張膽的攻擊我。因爲那個時候，共產黨還想以擁蔣爲招牌，而遂其陰謀。因此不關重要的小事情，他的確常常忍耐和含默。然而這完

全是共產黨的策略，並不是他們忠於國民黨，這是我們要看清楚的。

以下就述此次武漢叛黨叛國運動中經我所親見的事實。

三 武漢叛逆運動的內幕

這次武漢的叛逆運動之所以能夠發生，實因為本黨叛徒和共產黨徒的互相勾結。共產黨徒利用本黨叛徒作招牌，本黨叛徒利用共產黨徒做背景，於是叛逆運動，才能發生。兩個要素，如果缺了一個，就不會發生這次運動。即使發生，也不會蔓延。自稱左派的本黨叛徒，不過是幾個人，既無羣衆，又無組織。他們幾個人，決做不出甚麼「運動」。共產黨既有堅固的組織，又有一部分受其麻醉的羣衆，所

以本黨叛徒，就利用他們作實力的背景。同時，共產黨雖然有一部分力量，然而決不能以共產黨的名義，反對國民黨，只能以國民黨反對國民黨。所以如果沒有本黨的叛徒，共產黨就沒有招牌可以利用。兩者互相狼狽，於是發生了這次運動。

他們的動機，自然不同。共產黨是整個的，本黨叛徒是個人的。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的用心，已非一日，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所以他們對於國民黨的忠實黨員，三民主義的真正信徒，總要盡力抨擊，使其沒有立足的餘地。他們知道蔣總司令是三民主義的真正信徒，是國民黨的忠實而有力的黨員，所以他們知道要消滅國民黨，非先打倒他不可，於是發生這次破壞國民革命的運動。至於本黨叛徒的

動機，實在是卑劣已極。就是他們不得志於國民黨，於是甘心認賊作父，作共產黨的傀儡，以報他們的私仇，以遂他們的私圖。彭澤民因為被免去農民部長，於是倒戈，這是許多人所知道的，鄧演達孫科都是因為不得意，才去投降。尤其可笑的，徐謙因為蔣司令不和他詳細談話，而引起他的反動。（這是他親自對我說的。）所以他們的動機，都是齷齪不堪。然而共產黨就利用他們這種動機，用他們作演雙簧的小醜。

四 我所知道的叛逆運動的經過

總司令於一月中旬到鄂巡視。到武昌的那一晚，就在總部行營，

開盛大的歡迎宴會。我因當天奔走疲勞，沒有赴宴。次日，晤鄧演達。他對我說道：「昨晚你怎麼不去？鮑顧問有極重要的演說。這篇演說，極有價值，對於革命，有很大的影響。」我當時很悔懊，爲甚麼不去聽這篇「極有價值」的演說！後來才知道這場演說，完全以教訓的口吻，侮辱並且威嚇總司令，使他對於共產黨，不敢有何舉動。演說大意，是說：「吳佩孚壓迫農工，他的結果你們已看見了。以後若有人想以吳佩孚的手段，對待共產黨，那是萬萬不行的。」他的意思何所指，我們可以不言而喻了。當時翻譯的，是孫科。聽說他翻譯的神氣，比鮑羅庭演說的神氣還要實足。爲甚麼鄧演達以這篇演說，對於革命前途，很有價值？因爲這個時候，鄧演達對總座已抱不滿。原

來總政治部重要位置，都用共產黨的黨員。其中以朱代杰爲最有力。他是秘書處長，同時又兼代宣傳科長。總政治部的事，差不多由他一手包辦，他們暗中當然爲共產黨進行所謂秘密工作。總司令查得真相，遂於去年十二月底，撤去其本兼各職。鄧演達對總司令不滿意，就從此始。因爲朱代杰是鄧的靈魂，鄧以爲免朱各職，就是免他自己的先聲，就是對他的示威。於是本年一月初旬，親往南昌辭職，并舉顧孟餘爲後任，以探總座的意思。當時總座極力慰留。以後總座來鄂時，更委他爲武昌中央軍校代理校長。可見總座對他并無成見，而且仍舊信任，誰知鄧竟聽共產黨的挑撥，與總座日形隔離，終竟演此大不韙，我們實在替鄧演達可惜。

總座委鄧爲代理校長，同時委學兵團團長張文白同志兼中央軍校教育長，委我爲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委惲代英爲政治總教官。惲代英是鄧的靈魂，鄧演達的許多主意，都是惲替他想出的。文白同志爲極忠實的國民黨黨員，所以他們對於他非常懷疑，除軍校的事務外，關於政治黨務等事，都沒有和他商量。我當然也是他們懷疑的一個人。所以當時我和文白同志的地位，非常難於應付。

二月間，戴季陶先生到鄂，約鄧演達，李漢俊和我，在黃昌毅同志家晚餐談話。次日，季陶先生約鄧赴贛。鄧去贛一週未回，於是共產黨在武漢造起謠言來了。他們說鄧演達在南昌，已被扣留，季陶先生用苦肉計，他這次來鄂的任務，是在誘鄧赴贛。這種謠言，未免滑

稽！忠厚仁慈的季陶先生，怎能使用苦肉計，這不是太冤枉了嗎？然而竟有一部分人受其麻醉。總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共產黨員章伯鈞，對我也這樣說，我力爭決無此事。他始終要這樣說。

在鄧演達被扣留的謠言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演達却安然回到武昌了。於是共產黨又造謠言，說鄧演達幾為總座所鎗斃，幸得設法逃出。共產黨不僅在外造謠，并令其黨徒惲代英對鄧說，他們得到確實消息，總座一定要殺他。鄧被他們挑撥，於是開始叛逆了。

鄧演達回到武昌的頭一晚，我便到他家中去看他。當時章伯鈞，老奸巨滑的惲代英，以及共產黨五等走狗楊澍松，早已在座。我深悔不應該來，因為他們正在討論甚麼問題，却被我打斷了。他們停止了

談話，和我敷衍。鄧演達問我道：「個人獨裁和黨的權威，應該注意那一方面？」鄧發問後，他們八隻眼睛釘着我看，聽候答覆。我起初奇怪他怎樣發出這種幼稚的問題，後來看他們的情形，即刻就覺得是探詢我的態度。我便立即答覆一句不着邊際的話道：「如果真正發生個人獨裁這一類的事，我們自然應該尊重黨權。」刁鑽古怪的渾代英即刻敷衍我，說了一大篇話，大意是再三辯明他們的意思，不在倒蔣，只希望蔣尊重黨權。我當時默而不言，點首而已。不過腦中發生了許多疑問。就是蔣在何時何地蹂躪了黨權，必須他們來希望他尊重？如果拿着三月二十的事件來說，那末，他們所謂的黨權，就不是國民黨的黨權，而是共產黨的黨權。蔣校長是國民黨的黨員，爲甚麼要尊重

共產黨的黨權？然而對於他們所說不想倒蔣的話，却也相信。因為當時我以為他們決不敢倒行逆施。不顧大局，竟到這個程度。在國民黨的軍人中，除却蔣校長外，誰有指揮全軍的資望和能力？他們如果顧及革命的前途，決不敢有這種舉動。以後才曉得我的觀察錯誤。共產黨只求共產黨的成功，不顧國民革命的成敗。如果革命失敗，於共產黨有利益，他們是不惜犧牲革命的。我當時未便久坐，即行告辭了。

第二天晚上，因為開學典禮的事，我和文白同志赴鄧演達處。俾代英章伯鈞以及共產黨五等走狗楊樹松，又先在座。談話之間，看見棹上置有幾張小傳單。文白同志便取來看。章伯鈞即道：「這是秘密東西，現在還未公開。」這是甚麼？便是所謂「黨務宣傳大綱」。當

時他們有所顧忌、還不敢發表。但是過了幾日，便在報上大登特登起來了。我和文白同志事畢即行告辭。我們兩人看了所謂「黨務宣傳大綱」後。異常煩悶，兩人相對唏噓。

第二天，便是中央軍校和學兵團開學的日子。徐謙，孫科，彭澤民等都來了。他們的演說，不約而同的對蔣校長攻擊起來了。素行卑鄙，共產黨二等走狗陳其瑗也來推波助瀾的狂吠一場。我當時的神經，受了異常的刺戟。次日，接得南湖來的電話，知道文白同志病了。文白同志，是極有血性的忠實黨員，看見他們這種破壞革命的行動，當然要生煩悶。當時我以他的病，不過是心中煩悶的「政治病」。下午去看他，方知他因「政治病」而生了「生理病」了！他瘦了！我

在他家午餐，兩人談了兩三點鐘的話，然而總是楚囚對泣。想不出具體的辦法。

有一天，鄧演達來到學校。問起文白同志的病。我說：「他的確是病了，你應該去看他。」他答應去，并約我同去。坐在汽車上，兩人所談的話，非常重要。因為從這個談話中，可以知道鄧演達對於共產黨，究竟迷信到甚麼程度。他談的話很多，最重要的就是他說：「共產黨人說反共產就是反革命！雖然覺得不好聽，然而事實上確是如此。反共產的人，一定反革命。」這種不合邏輯的話，我只付之一笑。因為當時共產黨徒很排擠我，并且在他面前說我一些壞話，所以他當時又對我道：「共產黨排斥非共產的人，我們不應該埋怨他們。」

這是他們的整個的要求。他們要保證革命的勝利。不得不如此。」他當時的確還沒有加入共產黨，最後他又道：「我們現在所居的地位，乃是革命的掩護者。」我聽了他許多話，心中早已不快，於是與奮的答他道：「你這不過說好聽一點，如果不客氣的說，甚麼叫做革命的掩護者，不過是共產黨的工具罷。」他微笑不語。

車到南湖，我很希望他和文白同志懇切的談一番話，誰知他竟受共產黨的挑撥。不肯開誠佈公的談。共產黨說文白同志是右派（？），鄧演達竟受他們的挑撥，把國民黨的忠實同志，當做外人，談話無結果而散。

武漢反蔣的空氣，被共產黨造得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了，然而還

不敢提出倒蔣的口號。文白同志因校長電召赴贛了。數日後，即行返鄂，并云校長決定來鄂，出席第三次中央執委會會議，並決定居住學校。我們於是忙着籌備住處，然而以後竟因為中央執委會會議為共產黨所操縱，李協和先生中途退席，校長遂因之不願出席了。

原來中央常務委員，在南昌議決三月十二號，總理逝世之日，在鄂開第三次全體會議，以紀念總理，而共產黨徒及徐謙孫科等，堅持十號開會。十二號開會，是常務委員會的議決，此日又是總理逝世的紀念日，況且十號和十二號，中間只隔一日，當時又非萬不得已的時候，共產黨徒及本黨叛徒，如果顧及革命利益，為甚麼不延期兩天。為甚麼一定要堅持早兩天開會，以引起黨的分裂。這是鮑羅廷在內主

使，共產黨在內作祟，要使第三次執委會議，完全爲共產黨所操縱，好通過有利於共產黨的議決案。

開會那一天，發生軍校學生和工人衝突的事。那一天，在漢口開黨員大會。省黨部要我們學校派學生參加，於是派了一千人過江預。我當時深恐出事，所以率政治部秘書親自過江指導。學生在一碼頭整隊時，我便乘車先赴血花世界（會場）視察。到了那裏，才知會已開完，羣衆已陸續散了。隨即趕回，路遇隊伍。我便令帶隊者帶學生迴繞一次，即行過江返校。我見無事，便先過江返寓了。下午五時左右，連得幾個電話報告，說學生因工人口呼打倒我們校長的口號，因而彼此衝突，並帶工人回校。我即趕赴學校，打算不承認這四個人是

工人，把他們當做流氓地痞來辦。後查他們均有工會徽章，因之沒有法子。當時各級黨部紛紛開會，共產黨學生非常活動，所謂左派（？）學生附和之。黨部的議決。要懲辦肇事的份子。他們舉發了很多的官長學生，要求學校處罰。我因為鄧演達是代理校長，所以向他請示。他令我黨部議決的案，一定要執行。於是我忍着滿腹的痛苦，看着執行黨部議決的案件：開除，撤差，禁閉。我政治部的組織科長被他們禁閉了，宣傳科長被他們警告了。我當時不遭他們的毒手，實在萬幸。

世界上有甚麼公理！這次事件，完全是共產黨造成的，然而共產黨却用他們的勢力，把責任完全推在忠實純粹的學生身上。衝突的原

因，是因爲學生在血花世界休息時，遇着湖北省總工會的糾察隊和宣傳隊，開宣傳會議。他們演說，捏造了校長許多謠言，並極力申明非打倒他不可。當時反蔣的空氣，表面上雖爲共產黨造得異常濃厚，然而却無人敢明目張膽提出打倒的口號，學生親自聽見他們大呼要打倒在前方拚命革命的校長，如何不認他們爲反革命。校長是革命軍的總司令，打倒革命軍的總司令，乃是孫傳芳吳佩孚的口號，和要求，現在工人也照這樣大呼，是不是和吳孫等一樣的反革命？學生打人，固然行動幼稚，然而他們的動機，實在非常純潔，怎樣應該處罰？然而在那種空氣之中，有甚麼公理可講？以後武昌中央軍校，遂變成無政府狀況，軍紀蕩然了。學生可以自由禁閉官長，語言稍一不慎，就

被目爲反動派，橫加摧殘。我和文白同志，也束手無策，只有聽其自然。因爲上面有個代理校長鄧演達，下面有共產黨及所謂左派（？）的學生。我們有甚麼辦法？

工人當時開會的紀錄，被學生拿來了。我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見其中說話最多，誣蔑校長最甚的，就是共產黨做工人運動的林育南。共產黨誣蔑革命領袖，欺騙工人，煽動工人，這也是一個鐵證。這本紀錄，以後硬被總工會索回去了。

共產黨所操縱的第三次中央執委會會議，不久閉幕。他們自然也通過了許多議決案。內中有一個議決案，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就是他們議決共產黨要和國民黨共握政權，共同組織政府！而這個議決的原

因，乃是根據第三國際議決。因為第三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策略變更了。

原來第三國際，以前是把中國革命看做國民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兩段。在國民革命的進行中，共產黨只居在野黨的地位，壟斷羣衆運動，把持黨權。等到國民革命，到了相當程度，然後才起來打倒國民黨，掌握政權。所以以前共產黨，禁止其黨員作官吏。在他們這種政策之下，國民黨在政治上的生命，還有相當的期間。因為國民革命未到相當程度，國民黨黨權，未盡爲共產黨所把持，羣衆未盡爲其所操縱之前，國民黨在政治上，還有相當時期的生命。現在第三國際的政策變了，他們把中國的革命，不分做兩次——國民革命與社會革命——只

看做一次了。他們認國民革命就是社會革命。在現在革命的進行中，共產黨應從在野黨的地位，變為在朝黨；應於操縱黨權之外，再掌握政權。因為第三國際有這種議決，所以共產黨所操縱的此次中央會議，也有這個議決。他們實行這個議決的第一步，就是以共產黨的譚平山為僞國民政府的農政部長，蘇兆徵為工人部長。又以共產黨的董用威為湖北農工廳長，張國恩為民政廳長，劉芬為司法廳長。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共產黨腐化了，共產黨員也做官了；其實乃是他們整個的計劃，乃是他們用蠶食的手段，消滅國民黨的陰謀！

同志們！總理不是主張「以黨治國」嗎？以黨治國，就是主張在憲政時期沒有達到之前，國民黨單獨主持政治，不容主義不同的別個

政黨驕入。現在所謂「中國國民黨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竟破壞總理手定的「以黨治國」的原則，議決請共產黨共同治國！這不是明目張膽的背叛總理，甘心賣黨嗎？而且事實上，武漢偽政府的一舉一動，莫不聽命於鮑羅廷和共產黨，所以他們實際上也是以黨治國，不過他們是以共產黨治國罷了。

校長由南昌出發，赴前線指揮作戰，抵九江時，電令文白同志赴潯，令其將學兵團開赴安慶，作為北伐總預備隊。文白同志返鄂，共產黨即強迫其辭去軍校教育長和學兵團團長等職，截留學兵團，不許開拔。文白同志遂被迫離鄂了。當時滬寧未下，前方戰事非常緊急，校長調學兵團為作戰總預備隊，關係戰局匪淺，而共產黨徒，竟截留

不許開拔，這不是明目張膽的阻撓北伐，破壞革命嗎？校長日望學兵團開拔，然而因為文白同志在鄂，竟無通信自由，所以校長關於武漢截留學兵團事，竟毫不知道。校長到安慶，尙給我一電，詢文白何以竟無消息，學兵團已否開拔，並令我急赴安慶，這封電報被共產黨在電報局查獲：於是我們的行動，便不能自由了。鄧演達寫信並當面要我作文表示態度，並明白要我反對個人獨裁，反對擁護個人的小團體。此時文白同志已離鄂，我愈覺孤立。惟有表面上和他們敷衍，徐圖逃出的機會。因作一篇空洞的文章，大意說要打破足以釀成個人獨裁的環境。此文發表後，我的朋友，都笑是滑頭文章。有一天遇着鄧演達，他對我說：「你的文章我看見了，你真利害！」我仔細推敲「你

真利害」四個字，知道他看穿我的文章，不是出於本心，不過是敷衍環境而作的。我的朋友勸我一面預備潛逃，一面和他們敷衍，再作一文，而恽代英等亦強迫我明白表示態度。在他們高壓之下，遂再作一文，大意說國民黨內，有一部分代表土豪劣紳和資本階級的勢力，有一部分代表多數工農羣衆的利益。然而誰屬於前者，誰屬於後者，我仍沒有說明。因此，他們仍不滿意。他們一定要我指出校長來攻擊。這件事，就是殺我的頭，我也不願做。不但如此，就是每次開會，他們狂呼打倒校長的口號時，我也不過啞着張口，敷衍耳目，從未出聲叫過一次。

汪精衛到鄂了。我遇着他時，真不好意思，因為我以前爲廣大

事，太把他罵得利害了。他假裝沒事，裝着狠誠懇的樣子，和我握手，並說有暇當特別約我談話。有人批評汪精衛，說他「慇懃勤勤，誠誠懇懇，敷衍衍衍，糊糊塗塗。」這十六個字、描寫他的態度，實是維妙維肖！

汪到鄂四處講演，辯明上海工人糾察隊，沒有衝入租界的意思，沒有圍攻龍華的舉動。並嘲笑吳稚暉先生行爲滑稽，校長和李濟琛同志等爲黨事痛哭。後來又聽見陳獨秀演說，他說：「他們對汪先生哭起來了。我不知道他們的眼淚從那裏來的。說他們要黨，我實在不相信。」陳獨秀誣蔑，侮辱革命領袖，固然可惡，然而如果不是汪精衛以嘲笑態度對陳說及此事，陳獨秀又怎知道？

汪到鄂不數日，偽政府就決定免校長的總司令職務了。偽政治會議議決免總司令職的時候，譚平山在會場中大笑道：「十月革命實現了！」（這是我以後在會場中，聽見願孟餘說的。）同志們！甚麼是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乃是俄國共產黨推翻克倫茨基政府的革命，乃是共產主義的革命，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共產黨認免蔣的意義，等於俄國十月革命，就是認免蔣是實行共產革命的第一步，俄國十月革命後，共產黨掌握政權，實行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既以爲免蔣爲俄國十月革命，就是要於免蔣後，以共產黨消滅國民黨，以共產主義消滅三民主義。同志們，共產黨所把持的武漢偽政府膽敢免蔣，不僅想打倒蔣校長他個人，並且想打倒國民黨，所以我們忠實同志，努力擁

蔣，不是擁護蔣校長個人，乃是擁護國民黨。共產黨認免蔣爲實行十月革命，爲實行共產革命，我們就要認擁蔣爲擁護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

武漢中央軍校校長制被廢除，改爲委員制了。委員五人，譚延闓，徐謙，鄧演達，顧孟餘，恽代英。譚，徐，鄧，顧，都無暇管及校事，於是恽代英便以委員會之名，實行個人獨裁之實！他們口口聲聲誣蔑別人爲獨裁，極力反對，而他們自己的行爲，無往而不獨裁！然而這乃是共產黨的策略。同一行爲，在別人爲之，則爲妥協，右傾；在共產黨爲之，則爲「革命的策略」。例如近兩三月來武漢偽政府對於帝國主義者的態度，明明是屈伏，而他們偏美其名曰「革命的退

却」。曰「退一步進兩步」。所以惲代英獨裁中央軍校，實不足怪，這原是他們慣用的手段。他們只許自己獨裁，不讓別人獨裁！

學校改爲委員制後，不久我就提出辭呈，辭去祕書長和政治部主任的本兼各職了。呈上後，惲代英打電話告我，許我辭去祕書長，至於政治部主任一職，仍要我擔任。大約他們以爲一時都准我辭去，未免太露痕跡，所以還挽留我擔任一職。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因爲共產黨有個口號，就是「團結左派」（？）。

他們反覆辯明，他們只排斥右派（？）而和左派（？）誠懇的合作，並希望左派（？）有堅固的組織。所以他們事實上雖然排斥我，而表面上却送我一個左派（？）的尊稱。（今年一月以後，他們不叫我做西山派，而說我是左派（？）

了。共產黨的手段，真正變得快。）如果表面上太排斥我，恐怕引起他們所謂的左派份子的反感，因此，還和我敷衍。這種鬼計，我如何看不穿。所以我雖然仍舊擔任政治部主任，事實上常稱病不到校，以祕書代行職權。他們也知道我的意思，所以讓我在家唱留聲機器，打麻雀。關於政治部的事，慚代英竟和政治部祕書辦理，不再和我商量了。

現在還要補述一事，大約是四月二十左右的事。我一天忽然接得一個通知，請我明天到南洋大樓，討論重要黨務問題。下署名譚延闓，汪精衛，孫科，徐謙，譚平山。奇怪了！他們不是所謂政治會議的委員嗎？怎麼忽然邀我開會？我想我是軍校政治部主任，大概明天

的會，各級政治部主任都要參加。會期是下午一時，照例是不能按時開會的；我二時始去，到的人還不過幾個。我一進門，使我吃驚的，就看見一個光着前頂，黑黑面皮的人，正和一人坐在沙發上談話。這位光頭不是陳獨秀嗎？他幾時來的？他看見我，就立刻站起來，和我握手，一方面說道，「許久沒見。」我答道：「三年多了。」他重復坐下，繼續他們的談話。我便也選一張沙發坐下。開會的人陸續到了。譚延闓，汪精衛，孫科，徐謙，唐生智，朱培德，孫夫人，廖夫人，陳璧君，鄧演達，謝晉，李漢俊，經亨頤，詹大悲，彭澤民，吳玉章，王樂平。共產黨方面，爲陳獨秀，譚平山，瞿秋白，張國燾，毛澤東，夏曦，惲代英，高語罕，陳啓修，董必武，林祖涵，楊匏爾，

張太雷，蘇兆徵，彭述之，鮑羅廷，路易。以上這些人，是我認識的，其餘的都不認識，大約一共有四十餘人至五十人的光景。今天究竟是甚麼會？政治部主任，除我外，我認識的只有林祖涵。其餘我認識的政治部主任，都沒到會。今天的會，好像非常重要，爲甚麼要我參加。我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孫科跑到我的面前道：「人都到了，我們坐起來罷。」開會了。汪精衛主席報告道：「今天由政治會議，召集兩黨比較重要的同志開談話會，討論兩黨以後的合作辦法，以及應付時局的政策。」隨即報告東南狀況，誣蔑，攻擊，無所不至。以後演說的，有陳獨秀，徐謙，譚平山，鮑羅廷，路易等，總不外攻擊校長。時已六時，遂決定下禮拜一再開會。第二次會議，由鮑羅廷

和陳獨秀提議，決定由政治會議和共產黨的政治局，合組革命委員會。以後一切政治，外交，軍事，財政等政策，都由這個委員會討論通過，然後交政府執行。這個委員會，就是武漢偽黨部及政府的最高機關，這便是實行第三國際的策略——建立國共兩黨的聯立政府。同志們！國共兩黨的聯立政府，以黨治國的原則到那裏去了？當時鮑羅廷又主張須擴大這一類的會議，召集民衆團體參加。以後武漢每星期六所開的「時局討論會」，就是執行鮑羅廷的主張。鮑又主張發表宣言，說明兩黨合作的理由，交政治會議起草。以後不知這篇宣言，如何沒有發出。時間不早了散會了，決定下次再開。汪精衛並云，這個會議，以後務必常開。但是以後我便沒有接到通知，不知他們以後有

沒有開會，或者是開會不要我參加了。他們爲甚麼讓我參加了兩次？我始終莫明其妙。後來聽說是譚延闓極力主張要我參加，不知究竟是
否確實。

五月初，湖南來了一位朋友。報告湖南對我的空氣很不好，說我是校長的走狗，是戴季陶派。他勸我設法。我便老實告訴他，我早預備離開武漢。川資已籌得了，一切都預備好了，只等機會。

鄧演達到河南去了，中央軍校也改爲中央獨立師，忙着預備開拔了。我想乘此機會逃走，遂托病請施存統代理政治部主任。一因施存統雖爲共產黨員，然而和我私人感情甚好，並且他和一般共產黨員不同，比較明瞭，並且穩健。（共產黨說他是書呆子。）一因爲共產

黨早已決定比較重要的各軍政治部主任，都要以共產黨員充當。因此我便請施代理。他答應後，我就正式呈請，當然得了批准，並決定我爲後方留守主任。

五月十六，軍校舉行特別部成立典禮。我已決定十七號上船，因爲敷衍耳目，特別也去到會。會場中，真是赤霧瀰空！陳獨秀，高語罕，彭述之，還有九個共產黨徒，都被惲代英請來講演。他們的講演，除却誣蔑校長外，沒有別的話。我懷着鬼胎，心想如果他們曉得我明天上船，今天一定拿我去槍斃。散會回家，才知道船要十八才開。又要延長一天，心中焦急如焚。十七下午，中山大學開委員會，我又不能不去敷衍。下午四時，先過江到漢口約定家眷明天過江。十

八上午，家眷到了旅館，我便脫下武裝，裝做土豪劣紳的樣子，趁着九點鐘以前，碼頭上人少的時候上船了。一上了船便無事了。這便是我「逃出了赤都武漢」的大概經過。

前幾天武漢來了一個同事說，武漢偽政府，已加我放棄職守，携眷潛逃的罪名，下令通緝了。這種馬後砲，實在無聊之至！

民國十六年八月出版

定價大洋壹角五分

著
者

周
佛
海

發
行
者

大
同
書
局

上海山東路一號

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分析比較

林跛殘著

定價大洋八分

全書目次

- (一) 草本篇之動機 (二) 主義發生之原因 (三) 生存與物質 (四) 勞資調和與階級戰爭 (五) 國民革命與階級戰爭 (六) 以黨治國與無產專政 (七) 節制資本與剷除資本 (八) 各得其所自食其力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九) 國民黨容納共產黨 (十) 我對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忠告 (附錄) 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分析比較表

上海

山東路
第一號

大同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1141B

12